■ 齐鲁名士

他的职业，不过是“乡里句读师”。62岁时，他被省志馆聘去参加纂修《山东通志》。三年后任务完成，他不受奖酬而返故里。

在他66年人生岁月中，大半光阴用来独立钻研，使顾炎武这位江东大儒一见倾服，并赞叹他——

张尔岐：隐没乡野的卓然经师

□ 本报记者 卢 昱
本报通讯员 门 波

秋分时节，黄河北的济阳县郊区一派繁忙。

打听三五个在田地里掰玉米的农人，“张稷若村”怎么走？他们都会热情地指示。有的热心人还指引如何去张稷若先生墓。

对张稷若，济阳乡民张口闭口尊称“先生”。三百余年的光阴，在一茬茬秋收秋种间流逝。在张稷若村东北的一片玉米地中，张稷若的墓极其普通，既不高大也不壮观。他长眠于一直扎根的土地中，复制着生前的低调……

张尔岐画像

耕读之家出蒿庵

万历四十年七月二十二日（公元1612年8月18日），济阳县南乡柳树王庄的张行素家热闹起来——他的夫人郭氏生下第一个儿子，全家高兴，尤其是行素的老爷子张兰老人，更是乐不可支。

这孩子一出生与其他婴儿并无二致，但随着年龄增长日渐显现得聪颖异常，大不同于一般儿童。所以张行素私下里对他的夫人郭氏说：“这孩子将来恐怕不是池中之物，现在就能看出他的才气了。”

“这孩子就是张尔岐。他字稷若，自号蒿庵处士，又号汗漫道人，世称蒿庵先生。蒿庵一生未出仕，隐居在家做塾师，埋头著述，研究学问，直到康熙十六年腊月二十八日病逝。”山东省张尔岐研究会副会长艾明义介绍道。

这柳树王庄，本是一极普通小村。后来因张稷若先生名望渐重，县内尽人皆知，其村人外出逢人问及居址时，唯恐人家不知柳树王庄，便说是“张稷若庄”；外村人因景仰稷若先生，也喜欢称他的村庄为“张稷若庄”。长此以往，“张稷若庄”就取代了柳树王庄之名。

在济阳农村，至今仍盛传张稷若先生能呼风唤雨，腾云驾雾，掐诀念咒，撒豆成兵。据说他家常年挂着一盏极为普通的纸灯笼，灯笼上剪贴的纸花是一株豆秧，一只蝈蝈。奇异的是，这只蝈蝈如果一早爬到豆秧顶部叶上，这天准晴；如果蝈蝈藏在豆秧根部的豆叶底下，那这天要么阴天要么下雨。

传说还得折射回现实中解读。张尔岐的父亲张行素一生爱儒学，但少年时因病辍学未能深造，终生引以为憾。他也曾见过一些世面，在明季王爷藩府中当过小吏，谒铨时因不肯贿赂铨官，被“发配”到千里以外的湖北石首驿丞，至任三日，因念及年近古稀的父亲无人奉养，便告老还乡了。

辞职归田后，张行素一面勤奋耕种，代父操持家务；一面延请名师教授并亲身严厉督促儿子刻苦读书。学塾就在张家的胡同大门右首，他不时到学塾院内驻足，听到张尔岐诵读时则喜，偶尔听到儿子与人谈及读书之外的事，便训斥道：“时光不可逝而复来，为何闲谈而白白浪费掉了？幸亏我现在尚且健壮，如不趁早自我督促，以后再想有今日机会就来不及了。”

张行素虽家处偏僻乡村，又世代务农，家中原本没有几本书，但只要见到坊间书肆有善本或家中未有的书，便不惜重金购置，先后积蓄至5000余卷。他还惜纸如金，偶见地上有扔掉的废纸，不管闲忙缓急总是捡起放袖中，以教育儿子们节俭读书，爱惜笔墨纸张。

张行素有四个儿子，尔岐为大。尔岐二弟名尔嵘，自幼双目失明，生活全靠家人照料，尔岐对他一直关怀备至。三弟名尔徵，是兄弟们中最聪慧的一个。四弟名尔崇，字季厚，小尔岐13岁。

甲子之夜遣神兵

张家虽不大富，但过得安稳，奈何遭遇改朝之灾。明崇祯十一年（公元1638年）冬，清兵入侵关内，兵至山东。张行素留守家中，让家中老大张尔岐带家人逃难，途中尔徵与尔崇被掳走。到了沧州，据说尔徵死于乱军之中，尔崇被清兵砍伤后又复苏。

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一天，一股清兵袭至柳树王庄一带，留守家中的张行素率领僮仆准备逃避，大家随身带着刀矛棍棒以防不测。不料恰遇清军骑兵十数人，眼见走不脱，行素对僮仆们说：“看来非迎战不行了，如果一跑，清兵就会追射，我们会立即丧命，倒不如力战一番，或许还能夺条活路。”说着就向清兵冲了过去，僮仆们也跟了上去。清兵的箭矢纷纷射向他们，却都没射中。行素平日就善于骑射和搏击，僮仆们又都肯用命，他们飞快逼近了敌人，刀枪棍棒交发齐下，登时击毙清兵二人，其余仓皇逃走。

不几日，有个叫王东明的邻居，偷偷割下一名被击毙的清兵头颅，冒充张行素的家仆到济南府领得赏银50两。济南府的官员们便在闹市冲衢榜示张扬，说张行素“手刃一虏”，意在鼓舞民气。不料此事为清兵侦知，深恨行素，遂在次年南侵后北还时，于正月十六日将其掳去杀害。

元宵节一过，本盼着团圆的弟兄们辗转回家，发现除兄弟死伤外，父亲竟被清兵杀死。遭此巨创之后，人死业败，七零八落。

这突如其来的惨重打击，使还在做着科举美梦的张尔岐，顿时如江心翻船，蓦然间六神无主。随后，他“形神惨悴，茕茕孤立”，忽然发狂失去理智，先是想投水自溺，后又想穿上道士服弃家出走，只因见老母在堂无人奉养，才不得已作罢。于是，他对劫后破败的房舍也不修葺，任那杂草蔓塞院内路径也不拔除，而将自己住的小屋命名为“蒿庵”，终日深居简出，不闻不问世间之事。

张尔岐生性至孝，父亲罹难后，他的床头枕边经常泪痕斑斑，无日不在哀痛思念。为此，他还终生不穿彩色的衣服，不吃肥腴的饭菜，不欣赏欢娱的音乐。

遭遇如此变故，张尔岐对大清可谓恨之入骨。在民间传说中，便有他反清复明的“段子”。据说，他剪了许多纸人、纸马和刀枪剑戟等，放在书箱里。这只书箱平日锁着，只有逢到甲子日夜深人静时，他才悄悄打开。这时候只见他手执阴阳八卦旗，踏天罡步地煞，仗剑作法。他口中念念有词，手中令旗一挥，那书箱中的小纸人如大梦方醒，各抄兵刃飞身上马，在阵阵喊杀声中跃出箱来。

张尔岐令旗左右摇摆，那人马也随着左旋右转前进后退，霎时间布成了奇门大阵。演练了一番阵法后，张尔岐再一次挥动令旗，那人马便分作了两队，一队进攻，一队防守，只听鼓角动天，喊声震地，攻守双方杀将起来。只杀得明月无光，旌旗失色。如此攻守转换几次后，张尔岐令旗一挥，鸣金收兵，但见那人马又纷纷跳入箱内，寂然无声，纹丝不动。

这时，张尔岐取来早已备好的桐油和漆，倒在盆里，又顺手拿起一把拂尘，将拂尘往盆里一蘸，吹一口法气，冲着书箱甩去，那油漆就像一阵雾气均匀地洒向那人马刀枪。如此一遍，两遍，一连洒了七七四十九遍，这才关上书箱，收拾妥当，关门睡觉。五冬六夏，阴晴雨雪，从不间断，只待经过七七四十九个甲子日，操练并油漆上七七四十九次，这些纸人纸马将会成为神兵天将。到那时时机已到，便可起事，这支神兵会立刻杀向清兵，攻必克，战必胜，所向无敌，驱除鞑虏指日可待。

传说只是人们意念的影射，张尔岐虽有志学兵法，可他也看到清朝立鼎是大势所趋。本想着走学而优则仕这条旧道的他，隐居不仕，布衣终生。

杂坐田父酒客间

仕途不成，便另辟蹊径，好在张尔岐有着深厚的根基。他七岁入学，接受识字启蒙教育后，从经到史，再到诸子百家，广为涉猎。他还意有所属，学兵家言。兵学当然要涉及天文地理，又从而去学天文地理。天时非常复杂，所以又学太乙、奇门遁甲、六壬、云物和风角等。

当时兵燹所及，“酷吏乘时杀人如草，釜量肉，泽量骨，惴惴潜身，不出户庭，日焚香诵《易》”。在兵荒马乱，生命朝不保夕的情况下，张尔岐足不敢出户，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躲在家中避难而读《易经》。

在而立之年，张尔岐已为日后研究学问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但他的学业也存在一个问题，那就是“学此不成，去而之彼，彼又不成，以又有夺彼以去者，不仅彼之夺此也。癸未前学固如此其不一也”。他这样说固然有自责自谦之意，但也是事实。这种学无统系、学无计划的弊病当然是事倍功半的，难以达到精深的目的。

尤其在张尔岐于家务农兼做塾师之后，时常“杂坐田父酒客间，剧谈神仙、方技、星卜、冢宅不绝口”。闲暇之时和农夫酒友一起侃大山，神聊的内容是神仙鬼怪、巫医星象、占卜吉凶、阴宅阳宅等等。这牵涉了他诸多精力，所以在33岁那年，张尔岐作出更弦易辙的决断，开始致力经学的学习研究，专心著述立说。

张尔岐做到了言行必果，一以贯之。明朝的灭亡，使张尔岐的学习更加勤奋自律严格。他自我加压，规定自己读经书，由原来的每天读一章，增加到每天读三章；学史书，由原来的每天学一卷，增加到学两卷。

张尔岐的后半生，三十多年如一日，没有一天不读书，没有一天不作学习笔记。因为家中不甚富裕，不能具膏烛，他就烧着柴火，在火堆前读书，常至夜分，以及闻鸡即起的情况更是常见。生活艰难到这种地步，毅力坚强到如此程度，也是罕见。66岁那年春天患病，依然坚持着《春秋传议》一书的研究编著，直到冬天去世。

张尔岐对学习内容分门别类，做了形象比喻。他在《蒿庵闲话》第九十则中，用生活必需的食品，对经书予以比喻。他认为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这六经，和孔、孟、程颐、朱熹的著作，好比五谷粮食，不可一日缺少。而一些为“六经”“四子”所作的那些传记、注疏、解释，就像蔬菜、食盐、果酱，是餐饮必需的调料；没有这些作料，就食之无味，甚至难以下咽，消化不了。

张尔岐的思想，于今也大有裨益。他曾提出过，士人治经研礼，首先要探究古人苦心著述本旨，从古人著《仪礼》等书包含着的自然秩序、人伦纲常、典章制度、言行举止、风俗民情等内容中，找出适合社会发展的模式，匡正明末以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疏学风气的泛滥。

独精三礼有遗说

顾炎武曾在《广师》篇说：“独精三礼，卓然经师，吾不如张稷若。”

“卓然经师”，这句话卓有见地。张尔岐一生主要经历是“乡里句读师”。句读什么？当时，自然是句读“经”。须知，“经”是很不好句读的。一般塾师，不过囫囵吞枣，不懂装懂，骗骗学生，也骗骗家长而已。张尔岐不然，他要把句读工作，当科学研究来做。

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曾撰文指出，张尔岐的《仪礼郑注句读》一书，就是研究成果之一。《仪礼》是“三礼”之一。“三礼”各具特色：《周礼》讲的是大制度，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等；但它的缺陷是可靠性小，真伪杂糅；《礼记》是孔门后学学礼的零星札记，人家把它叫做“零膏剩馥”；《仪礼》讲的是先秦上层社会人士的日常生活习惯，饮食如何，婚丧如何，宴宾客如何，祭如何，射如何，器服如何等等。其中有不少先秦礼俗可以追索。它在“三礼”之中，可靠性最大。但一般人苦其难读。故自王安石罢《仪礼》不置学官以来，对此古籍问津很少。

张尔岐作为一位负责任的塾师，他要对此古籍梳理一番。他根据汉代郑玄对《礼经》注疏，参考历代众多学者的成果，博采众家之说，结合自己的研究判断，编著了10卷《仪礼郑注句读》。通过不断沉潜，张尔岐对郑玄的注释作了诠释，所以叫《仪礼郑注句读》。

“张尔岐除对《仪礼》进行过研究整理外，对《周易》也颇有研究。他对《周易》的研读很是下了功夫，仅就《蒿庵闲话》一书来看， 即可看出这一点。是书内有读书札记百余则，其中关于读《易》的就约占四分之一。”艾明义介绍道。

在赵俪生看来，张尔岐研究《周易》所使用方法，可以说是低级方法和高级方法并用。例如他说，《易》越到后代越烦琐，“十翼”是后加的。远古之人，事简民淳，只凭卦名一家，已足以决犹豫。“后情伪日杂，人之聪明已不逮古”。这话初看起来，似是倒退论思想，其实不然。远古人使用的是原始综合思维，后世人使用的是分枝的逻辑思惟，张所说“不逮古”的“聪明”，是指原始综合思维而言。

再如，张尔岐说卦与卦之间的“相与”可分为“相徇”“相成”“相倾”三种关系。在这种说易中，就渗透着辩证法的意味。再譬如，在他的《周易说略序》中，他说，事物不可对待得太具体，太具体就容易僵化，“质言则专；专则滞。故愈详而愈多失”。这讲的显然是形式逻辑方法的局限性。

张尔岐提出，在“专”之外，还需要一种抽象的概括，他的原词是“影似”。“影似”即“事所不得兼者，理得而兼之；此之理不得兼彼之理者，理之象则无不得而兼之也”。这也就是经典作家们常说的，理性主义对感性材料的改造，会使人们的认识更深刻、更正确、更完全。

张尔岐自己发问，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爻，能把宇宙间人、物、事的运动、静止、变化包罗净尽吗？“具体地说，不能；但抽象地说，从影似的角度来说，能。”他自答道，所以他主张，研究《周易》要“销释凝滞”，就是克服形而上学，尽量恢复远古人的辩证法。

张尔岐在研究《老子》一书时，方法也较高级。他抛开注解，“以己意占度”，感到《老子》的“大义犁然”，可以通解。他感到过去人对《老子》的解说，像水加茶变苦、加糖变甜、加盐变咸、加醋变酸一样，全不是原来水的味道。这样，他感受到独立思考的优越性。

天道从来疑有无

谈及张尔岐的哲学思想，首推他的《蒿庵集》中首篇《天道论》。编集人将它放置在全书之首，实际上它也是最富有代表性的。最引人注目的是，张尔岐的一些论点与十七世纪最高思维水平的思想家王夫之的论点，竟有不少的“不约而同”。

在距离张尔岐两千多年前，大思想家荀况谈论过“天”“人”的关系。荀子把“天”描绘成压在人们头脑上的一口大锅。他宣扬“天道不可知”“人不可与天争”，人们要明确“天人之分”，就是说，天有天职，人对此无能为力。与这样的论点相比，张尔岐的论点明显进步很多。

张尔岐是从驳“天道不可知”开始。他认为，“天道不可知”的论者们是一些具有颓废人生观的人，他们铢铢以求，嫌“天道”不公，善恶祸福都不应验，所以他们说“天无道”。

张尔岐认为这样理解会“哀君子之心，作小人之气”。他认为有必要从社会道德的需要出发，把问题提到哲学上来予以谈论。他从“天人相及”谈起。“天人相及”，并不是什么新命题，荀况也谈“天人之分”，但张尔岐一开始给问题带来一个唯物的基调，说天、人之相及，是以气。什么是“气”？就是运动中的物质。他说“天”以其气寄于人，而出现了“质”，质立而兴起了“事”，事的衍变就成了“势”。

非常凑巧，王夫之也非常喜欢讲“势”，他说“势”字“精微”。张尔岐说，人世间的善恶祸福，处处都与“势”相消息。具体说，就是天以“气”授人，人接受了这种气就成为“命”。气有清浊、长短、多少，命也就有屈伸。王夫之比他讲得更灵通，他说“化在天，受在人”，天不停地授命于人，人不停地受命于天，王夫之把这叫“凝命”。

经张、王这么一讲，神秘的东西物质化了，死的、机械的东西活灵活现了。张更进一步说，事积起来成为势，但不是千篇一律的，要看所积极的“分”，包括数量和质量，积至其分则势成，势成则天道应。所以，关键在人的“自致”，或“尽吾力之所可至”。用现代的词汇表达，量变与质变的转化决定是否势成。

如此一来，大大启迪了人们的主动性。他告诉人们，“天命”不是预先定好的，不是死的，而是活的，可以争取的，天命是可以人为调整的。这种思想自然而然导向乐观和积极的人生。

这种思想也指导着张尔岐本人。隐居后他亦教亦农，更算得上“半个农民”。因此他不但熟悉农民，还与他们有着深厚感情。天旱了，他和农民一样心如汤煮；雨涝了，他和农民同样焦虑万分；庄稼遭灾了，他和农民一样悲苦凄怆，忧心忡忡。

张尔岐曾说：“傲人者，于人无损，在己则为恶德。”所以，他虽学识渊博，是位大儒，但并不轻视农民，也不摆旧文人的酸腐架子。农民乡邻对他不是敬而远之，而是亲而近之，有疑惑愿意向他请教，有愁苦和心事喜欢向他倾诉，有难处请他帮助，把他当成了完全可以信赖的朋友和老师。

一位乡邻不幸儿子夭亡，悲痛之中以为是命运多舛，找到张尔岐请求为他占卜。有着相同经历的张尔岐劝解他说：“天道这事到底是有是无，历来众说纷纭而不休，实在叫人怀疑。你不幸死了儿子，这是痛苦的，然而要拿这事去问鬼神那是没用的。唉！我盼你什么时候能再生个大胖小子就好了。”

对于夭折的儿子，张尔岐“开眼不见寐存之”，他强忍悲痛对乡邻说：“儿子夭折是令人十分悲伤的，别说传宗接代了，就是吃糠咽菜抚养这么大也非常可惜。可死亡渺茫难知，就是再会占卜的人也弄不明白。指望占卜算命找到改变命运，哪怕你算到哭干眼泪也得不到答案。你还是回去好好种田，自己劝解自己，自己解脱自己吧！”

张尔岐非常同情这位乡邻，但爱莫能助，只能劝导他理智地坚强地应对厄运而已。乡邻走后，他心情十分压抑，久久不能释怀，遂作七律一首，以自消胸中块垒，诗云：天道从来疑有无，难将此事托神巫。厉人亦鲜惊求火，嗟我何时看射弧。不作百年门户计，应怜七尺藜藿躯。茫茫难辨商瞿兆，欲叩荆焞眼已枯。

康成家法竟谁传

张尔岐46岁时，在章丘第一次结识顾炎武。直到张尔岐去世前，两人一直保持着诗书往来，互尊为师。顾炎武亲自为张尔岐的著作《仪礼郑注句读》撰写了序言。

62岁时，乡村塾师张尔岐被省志馆聘去参加纂修《山东通志》，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一件大事。他的交友层次提高，社会交往和视野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宽提升。在济南修纂志书期间，除了与顾炎武的交情步步加深外，张尔岐还结交了李焕章、刘孔怀、薛凤祚等几位外地朋友。这几个人，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和反清志士。因为顾炎武精通古今经史，知识最渊博，所以主编古迹山川；薛凤祚精通自然气象，熟悉中西地理，主编天文地理；张尔岐分工主编地方人物。

在共同修纂《山东通志》的日子里，张尔岐与顾炎武推心置腹的交流更多。在任务完成，即将分别时，顾炎武赋诗相赠，写下《己卯夏日过稷若先生书堂奉赠》一诗：“缁帷白室睹风标，为叹斯人久寂廖。济水夏寒清见底，石田春润晚生苗。长教六籍传无绝，能使群言意自消。窃喜得逢黄叔度，频过听讲不辞劳。”

顾炎武这首诗作，深情地描绘了张尔岐清贫、孤寂、艰难的隐居生活。诗作赞扬张尔岐致力经学，耐得住寂寞的高尚情操，赞扬张尔岐具有渊博的学识，把张尔岐比作东汉名士黄叔度。顾炎武为能结交到张尔岐这样的高士窃喜，多次登门拜访请教，也不觉得劳累，由此可窥顾炎武对张尔岐的评价之一斑。

李焕章在他的《织斋文集》中记载说：“每花晨月夕，耳热酒酣，友朋聚晤之乐，未有若斯之久者。”大家工作之余，在花香扑鼻的早晨和月光明媚的夜晚，相聚饮酒，脸红耳热……好友相处的快乐，从来没有像这样长久过。

这些志同道合之人在一起工作三年，直到圆满完成修志任务，各自回归。第三年，张尔岐64岁那一年秋天，可能是临分别的时候，张尔岐同顾炎武、李焕章、薛凤祚一起乘船游览了大明湖。

康熙十四年(公元1675年)，64岁的张尔岐与好友分别，从济南回到家乡后，继续从事他的经学研究和著述。康熙十六(公元1677年)年春天，他身患疾病，仍坚持着《春秋传议》一书的研究著述工作。至冬天病情加重，于腊月末逝世，终年66岁。他临终前口述墓志，简述了自己的一生所为。

张尔岐在病危时手书遗嘱一份，遗嘱中说自己既非太学生，又非生员，只是田野处士，“吾百年后当殓以处士之服，殡以单棺。昔葬先母，以贫之故不能备槨，吾断不可加厚。况汝辈贫乏有加于昔，岂可强力取咎。”他还说：“近日好侈，本是恶俗。古人裸葬矫俗，良有以也。”

子侄们遵从张尔岐的遗嘱，在他死后的葬埋就非常简而单之了。没有外槨，没有多少随葬物品，又不起坟山，只是一抔黄土，隐没在一般农人的坟墓中。

正在山西永济历山的顾炎武，得知张尔岐逝世的噩耗后，即写了《闻张稷若讣》一诗，表示哀悼。诗中说：历山东望正凄然，忽报先生赴九泉；寄去一书悬剑后，贻来十袭绝韦前；衡门月冷巢鳥室，墓道风枯宿草田；从此山东问三礼，康成家法竟谁传？

诗的大意说，忽然听到张尔岐先生去世的消息，从历山遥望东方，感到悲凉凄然。此前先生还赠给我他费尽心血写成的10卷书，“十袭”指《仪礼郑注句读》；可现在给先生寄去的书，只能像典故“悬剑”那样，他不能亲收了。这里顾炎武，是在借助典故，悼念张尔岐，说好友故去，葬于古坟荒郊。从此，再也不能与先生一起探讨《礼经》，请教“三礼”了。从此，系统传承汉代郑玄学派的还有谁呢？诗的字里行间，体现了顾炎武对张尔岐的深情厚谊和历史地位的高度评价。

张尔岐墓